

楚辞发生学研究

周菁风 著

● ● ● CHUCI FASHENGXUE YANJIU ● ●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苇风 著

楚辞发生学研究

CHUCI FASHENGXUE YANJI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发生学研究 / 周苇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633-7710-7

I. 楚… II. 周… III. 楚辞—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182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8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册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楚辞概念述评	(5)
第一节 楚辞概念的不确定性	(5)
第二节 文体意义上的楚辞	(12)
第三节 关于“楚辞”之辞	(32)
第二章 辞赋关系探源	(54)
第一节 辞赋辨体的复杂性	(54)
第二节 辞以韵文为限	(59)
第三节 辞与韵文在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64)
第四节 语文学范畴内的赋	(105)
第五节 文体意义上的赋	(116)
第六节 汉人观念中的辞与赋	(122)
第三章 楚辞产生的音乐文化背景	(129)
第一节 应该重视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129)
第二节 早期乐器以打击乐器为主	(131)
第三节 礼乐制度下的音乐特点	(140)
第四节 雅乐对诗歌形式的影响	(157)
第五节 郑卫之风与《诗经》以后的杂言歌诗	(165)
第六节 楚辞与新声	(179)
第四章 屈原作品的流传和结集	(210)
第一节 《楚辞释文》与《楚辞》的古本问题	(210)
第二节 《楚辞》传本非一	(221)
第三节 《楚辞》版本上的经与传	(235)
第四节 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	(241)
第五节 今本《楚辞章句》成书过程	(255)

第六节 王逸与《楚辞》编纂体例	(260)
第七节 从通行本《楚辞》的编纂体例看屈原赋二十五篇	(263)
第五章 今本《楚辞》述骚之作对屈原作品的解读	(268)
第一节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对屈原作品的叹述	(268)
第二节 严忌《哀时命》对屈原思想的解读	(271)
第三节 《招魂》《大招》《招隐士》对屈原作品的叹述 ...	(292)
第四节 《惜誓》《九辩》与屈原作品的关系	(305)
第五节 《楚辞》中述骚之作对理解屈原作品的意义 ...	(310)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后 记	(332)

绪 论

战国后期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是被誉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我国第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以他的作品为主的楚辞，是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它给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哺育了我国许多伟大的作家。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楚辞以其悲壮激越的情感和独立不羁的人格力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从贾谊以来，词人心慕手追，发愤抒情，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骚人传统。同时有关楚辞的学术著作也代不绝书，汗牛充栋。然而在两千年来的楚辞研究中，楚辞和《诗经》一样被置于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文化背景之上。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方法，要完全弥合屈原和儒家之间的缝隙，做到自圆其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就不断受到醇儒的质疑和非难。上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思想东渐，启迪人们从原始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楚辞中的神话和仪式。有人把楚辞的文化背景移植到巴比伦、印度，更有人无限地扩大楚辞文化的范围，制造大文化圈理论。也有人完全认定屈原为南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并把楚辞作为纯粹的民俗材料，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去印证、解释，把屈原完全等同于一个原始部落的巫师。这

一切过于简单的曲意比附，都使屈原及其作品面目全非。

楚人本来是从中原移居“蛮夷”的，楚国文化更多地继承了夏商巫鬼文化。只是这种文化和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西周时期，楚居“南郢之邑”，蛮荆之地，在政治上仍然归附周天子。楚国虽然曾向南开地千里，但后来重点向北用兵，目的就是想进入中原，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楚人心理上的吸引力。春秋时期，楚北部与宋接壤，宋与鲁为中原的文化之邦。鲁是周公旦的封地，代表周文化；宋是微子启的封地，尚保留不少殷商文化。因壤地相接和连年战争，更加快了楚与中原的民族文化融合，中原文化不断向楚国南流。如果说楚文化有其特点的话，也是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质，而南方文化为文。地理上越靠南，其文化就与中原文化越有区别，越具有地方色彩。反过来说，地理上越靠北，中原文化的比重越大。尤其是后来才并入楚国版图的“汉阳诸姬”和淮北一带，虽然受到南方文化的浸染，但仍然属于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沛在淮北，北接中原，甚至本来就是中原诸侯国旧地，后来才为楚吞并，虽然也受到来自南方文化的影响，但中原文化毕竟是其底色。由于楚文化更多地保存了夏商文化，从文化的传承上来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战国末期至于秦汉，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楚文化和各地文化融合为一，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春秋时期，周天子王权势坠，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战国之时，兼并战争更加激烈，邦无定君，士无定主。“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社会的变革和动荡也造就了旷古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局面。每当王纲解纽或易代之际，往往也是放言无惮之时。春秋战国时期，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对政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主张，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无所顾忌。当时既产生了积极入世的儒家和墨家，也产生了追求长生久视的道家和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哲学。《战国策》一书不但鼓吹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甚至公然

宣扬追求“势位富贵”，其政治观和人生观不仅为前人所未道，也为后人所不敢言。屈原生当战国后期，曾经“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身处时代的旋涡之中，其思想和作品内容自然要打上时代的印记，因此将屈原及其作品纳入“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是很困难的。

儒家被定于一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汉初以黄老治国，儒家甚至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即使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西汉政府依然采用“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楚文化受到政府推崇的西汉初期，屈原作品和《诗三百》一样被称为经。刘安编纂《楚辞》一书，即采取了以传释经的体例，屈原作品为经，后人的拟骚之作为传。保存在《楚辞》中的拟骚之作，并不是后人通常所理解的模拟之作，而是关于屈原作品的解读之文。出于对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的片面理解，无论是儒家诗教范畴中的楚辞研究，还是当今楚辞学界，《楚辞》中的述骚之作向来是被忽视的。早期的楚辞研究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儒教诗学范畴，在楚辞学史上独具特色，因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书在楚人的历史流变、楚地的地理环境、时代文化思潮和汉初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一、汉人的辞赋观念。在汉人的观念中，辞以韵文为限，包括歌诗和读式诗，赋则是不歌而诵的一种文体。由于春秋赋诗无出韵文之外者，汉人认为韵文在赋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汉代，歌诗可以称为辞，但不能称为赋。读式诗却既可以称为辞，也可以称为赋。汉人因韵文在赋中不可或缺，有时也称赋为辞。屈原以后文学作品与一般学术著作有了分离而独立的趋势，汉人辞赋连称，意思与现在“文学”一词相近。二、楚辞与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融合使得各国的音乐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具有了时代赋予的共性，燕赵之讴、郑卫之音、吴楚之风相对于西周“雅乐”而言都属于新声。雅乐旋律缓慢，音调平和，需要一种齐整方板

的诗体。《诗经》曾经先秦乐师整理,其音乐已经雅化,故不仅《雅》、《颂》部分,即使原属民歌的十五《国风》也是四言为主的、整齐的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新声得到巨大发展。新声因节奏自由活泼,旋律复杂多变,音乐句式参差不齐,与之相配合的歌诗形式也多长短错落。春秋战国时期杂言歌诗很多,句式长短错落、以“兮”字为主要标志的歌诗是杂言歌诗中的一类。荆楚的山川风物、民情风俗,被孟子视为“缺舌”的楚地方言,尤其是荆楚音乐,使荆楚民歌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屈原就是在荆楚民歌的基础上,“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创造了楚辞一体。句中带“兮”字的荆楚民歌对屈原作品的创作,影响尤其深远。三、《楚辞》一书的结集和流传。汉初屈原作品已被搜罗殆尽,并曾被提到了经的地位。今本《楚辞》一书经刘安、刘向、王逸等人陆续辑补而成,采取了以传释经的编纂体例,屈原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拟骚之作为传。四、今本《楚辞》中的述骚之作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今本《楚辞》中的拟骚之作都是关于屈原作品的解读之文,从中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状况,它们和刘安的《离骚传》、班固的《离骚赞序》等一样,是我们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宝贵资料。

“汉武好《骚》,淮南作《传》。”(《文心雕龙·辨骚》)自从刘安对屈原代表作《离骚》的思想意义及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作出精当论述以来,历代学者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蔚然成风,延绵不绝,在学术领域内自成体系,成为一项专门之学。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楚辞研究一直被置于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文化背景之上;近人受西方人类学思想影响,对楚辞生成的文化背景的理解又过于片面,因此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楚辞产生于文化迅速融合、思想极大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对楚辞的研究始于儒家被定于一尊之前,对楚辞发生机制进行探索必将有助于楚辞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一章 楚辞概念述评

第一节 楚辞概念的不确定性

“楚辞”这个名词,从现在所知的资料看,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又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如上所言,早在汉武帝时屈原的作品就被视为楚辞的一部分,开始被称为楚辞了。汉成帝时,刘向典校经书,辑屈宋作品和汉人拟骚之作为十六卷,题名《楚辞》。^①这样一来,“楚辞”一词又成为一部作品总集的名称。

王逸在《离骚后叙》中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纘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①王逸是在刘向《楚辞》十六卷的基础上作《楚辞章句》的。从流传至今的王逸《楚辞章句》可以知道，刘向《楚辞》十六卷中的作品除了屈原、宋玉等战国时期楚人的作品，还有汉人的拟骚之作，计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和刘向自己的《九叹》。宋人黄伯思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②屈原、宋玉等战国时期楚人的作品在汉初既已被称为楚辞，刘向将它们收入《楚辞》一书很容易理解。但从文本上来说，贾谊的《惜誓》和《吊屈原赋》、《鹏鸟赋》实在没什么不同，刘向为什么取此而舍彼？对此，朱熹不禁迷惑不解：“贾傅之词，於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於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③屈原的作品一出现，就因其中蕴含着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引起很多文人追慕效仿。正如王逸在《离骚后叙》中所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传教。……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纘述其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王世贞在《楚辞序》中说：“其人而楚

① 按上引王逸《离骚后叙》见中华书局用四部备要据汲古阁宋刻洪本排校纸型重印本《楚辞补注》。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三年黄省曾校高第刊本王逸《楚辞章句》所录《离骚后叙》则为：“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仰，摅舒妙思，纘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以为十六卷。……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② 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见《宋文鉴》卷九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朱熹：《楚辞辩证上·目录后序》，见朱熹《楚辞集注》，蒋立甫校本，1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则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辞则楚,其辞非楚而旨则楚。”^①自上而言,可以被称作楚辞的作品应该是很多的。然据黄伯思所见唐本《楚辞》是十八卷,除今本《楚辞》十七卷外,还有扬雄《反骚》一卷。^②朱熹以扬雄为“屈子之罪人”,其《楚辞后语》取《反骚》的目的是“明天下之大戒也”。^③不仅如此,朱熹《楚辞集注》还以“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为理由,删去了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和王逸的《九思》,增加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两篇作品。可见,由于《楚辞》编纂者去取标准不同,对楚辞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屈原等人的作品除被称为楚辞以外,又被称作楚骚、骚辞、骚些、楚些。清沈祥龙《论词随笔》:“屈、宋之作亦曰词,香草美人,惊采绝艳,后世倚声家所由祖也。故词不得楚骚之意,非淫靡即粗浅。”^④白居易《与元九书》:“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⑤明苏伯衡《古诗选唐序》:“风雅变而为骚些,骚些变而为乐府。”^⑥苏辙《和子瞻雪浪斋》:“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时招魂。”^⑦楚辞甚至被称作楚声、楚歌,游国恩《离骚纂义·总序》云:“夫楚辞者,

①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黄伯思《新校楚辞序》:“案此书旧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为十七。而伯思所见旧本,乃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此文亦见雄《本传》,与《九思》共十有八篇。”见《宋文鉴》卷九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朱熹《楚辞辩证上·目录后序》:“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又《楚辞后语·目录后序》:“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是为其失节,亦蔡琰之侍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扬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于无绝道,而于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分别见朱熹《楚辞集注》,蒋立甫校点本,168、2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④ 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40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⑤ 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⑥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⑦ 苏辙:《栞城集后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盖楚声之文也。观《汉书·王褒传》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隋书·经籍志》,有僧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证知骚人之辞,亦关声乐;诵读之方,与凡有异。今人日诵其文,究其义,独与此曹焉弗知,此何异诵《诗》三百,而不达其乐语乐舞之事乎?”^①另外还有人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辞”、“赋”、“辞(词)赋”或“古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班固《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晋皇甫谧《三都赋序》云:“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词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②《文心雕龙》有《辨骚》,又有《诠赋》。《文选》在赋之外,另立骚一目,又立辞一目。屈原的作品尽归骚类,辞类收录了汉武帝的《秋风辞》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两篇作品。自此厥后,人们多将辞、赋分为二体。如柳宗元的《柳河东集》,赋被编为一卷,而《乞巧文》、《骂尸虫文》等“骚十一首”编为另一卷。^③宋人周必大编定的欧阳修《文忠集·外集》二十五卷,列“古赋”一目,收《红鹦鹉赋》、《述梦赋》、《荷花赋》、《螟蛉赋》;又列“辞”一目,收有《啄木辞》、《哭女师》。^④他们都明确将骚或辞与赋分为二体。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⑤明代

① 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② 皇甫谧:《三都赋序》,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五,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重刻本缩小影印,1977年版。

③ 见柳宗元撰,韩醇训《柳河东集》卷二“古赋”,卷十八“骚十一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欧阳修撰,周必大编:《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李白:《江上吟》,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3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1986。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宋祁云：“《离骚》为词赋之祖。”^①李白、宋祁皆称屈原作品为词赋。而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他们又称屈原作品为楚辞。元代祝尧编《古赋辨体》，首列楚辞一类。吴讷《文章辨体》一书将屈作归入古赋一类，云：“载楚辞于古赋之首，盖欲学赋者必以是为先也。”^②说明他是将楚辞看作古赋的。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则于赋之前另立楚辞一目，作《序说》云：“楚辞者诗之变也。……风雅既亡，乃有楚狂《凤兮》、孺子《沧浪》之歌，发乎情，止乎礼义，与诗人六义不甚相远。但其辞稍变诗之本体，而以‘兮’字为读，则夫楚声固已萌蘖于此矣。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③他又将屈宋作品称作楚辞，以示区别于赋。至清代，争论更为激烈。王夫之著《楚辞通释》，林云铭著《楚辞灯》，蒋骥著《山带阁注楚辞》，称屈宋之作为楚辞者大有人在。而戴震则著《屈原赋注》，马其昶亦著有《屈赋微》，都明标屈原作品为赋。戴氏并于《屈原赋注·自序》中说：“汉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自《离骚》迄《渔父》，屈原所著书也。汉初传其书，不名楚辞，故《志》列之赋首，又称其作赋以风，有惻隐古诗之义。……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④今人也大多以赋称屈原作品，如沈祖棻有《屈原赋证辨》，姜亮夫先生有《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先生有《屈赋通笺》、《屈赋释词》、《屈赋音注详解》，等等。但也有人认为屈原的作品应该称辞或楚辞，不能称赋，理由是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与汉代典型的赋体，两者虽有联系，但区别更大，从作品的结构、句式、用韵规律，屈原作品和汉代散体大赋均有很大不同，把二者混

①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②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③ 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99~1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④ 戴震著，褚斌杰、吴贤哲校点：《屈原赋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淆起来是不科学的。金开诚先生著有《屈原辞研究》，并说：“‘辞’与‘赋’从文学创作的分类上看是有根本区别的，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区别，即‘赋’属于文的范畴，而‘辞’属于抒情诗的范畴。抒情诗不但以抒情为目的，并且以创造高度‘情意化’的抒情形象为主要的艺术特征，典型的楚辞如《离骚》、《哀郢》等就是这样；《九歌》中虽有叙事的成分，但其形象也是高度‘情意化’的。反之，典型的汉赋如《七发》、《子虚》、《上林》等就显然不是如此，即使有的汉赋句式整齐并且押韵，也不具备高度‘情意化’的抒情形象这一主要特征，所以它们是文不是诗。当然，由于辞赋之间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所以它们在创作上也有交错现象，未可根据时代先后一刀切开。如历来被称为‘楚辞’的《招魂》、《大招》、《卜居》、《渔父》诸篇实际上就是提前出现的赋；反之，出现在汉末的王粲《登楼赋》实际上却是一篇辞。文学发展是渐变的，联系、交错以至于渗透都是正常现象；但又必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典型之作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这才能看出发展中的质变。最早意识到辞赋之别的，应该说是六朝人。如萧统《文选》选了一些楚辞，却不归入‘赋’类，而别列一类称为‘骚’，置于‘诗’类之后；刘勰《文心雕龙》在《诠赋》之外别有《辨骚》。这都说明他们在严于文体之分的时代氛围中意识到了辞赋之别。但他们根据楚辞的代表作名为《离骚》而把所有的楚辞都称为‘骚’，却是不恰当的；其实只要恢复‘辞’这个原名就可以了。”^①郭建勋先生也认为辞、赋应该区分开来，“从汉初贾谊开始，辞赋一体的观念在汉代几乎为所有的文人所认同，到王逸《楚辞章句》出现，辞赋异体的观念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从此，这两种文体观就一直同存并行，辞、赋二体也因此交缠交错，混杂不清。后来随着文体分类的日益细密，在目录学著作中一般都辞、赋分别，总集则或分或合，难以尽述。然而

^①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4~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到了当代,由于人们对辞、赋类问题的漠视,尽管在具体的文体分类时大多将二体区别单列,但在许多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中,辞与赋却未能真正区分开来,尤其是在称谓上极为混乱,例如称屈、宋之作为‘赋’或‘辞赋’,称屈原之作为‘屈赋’、‘屈原辞赋’,将楚辞与后代的赋合称为‘辞赋’等。其实,‘楚辞’作为一种独立的韵文体式,与汉代形成的文体赋,在形式、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是两种互相关联却又互不包含的独立文体,在文体分类日趋科学和缜密的今天,继续使用这样含混的称谓,不但不应该提倡,而且是必须彻底纠正的”^①。在《楚辞、楚歌、楚声》一文中,郭建勋先生又说:“楚辞,一般认为,它是指战国末年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郁的楚国地域特色的诗歌。其实,它至少还有两个指向。其一,它指东汉时期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这部总集。集中不仅收了屈原、宋玉的辞作,也收了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汉代人的拟作。更重要的是,‘楚辞’还指一种特定的文学样式。它既包括已收入《楚辞章句》中的屈宋之作与汉人的拟作,也包括《章句》中未收的汉人其他拟作和汉以后历代文人模仿屈宋辞作的形式所写的作品。《楚辞章句·九辩序》曰:‘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楚辞。’尽管王逸在《章句》中将屈原所有辞作称为‘离骚’,而将宋玉以下诸作均称作‘楚辞’,以明其区别之意,但书中汉代拟作虽非全出自楚人之手,却能入选而得以与屈宋之作同列一书,显然是因为‘依而作词’、文体相类的缘故。这就使‘楚辞’这一概念的指向有所扩大,并兼具了某种特定文体的意义。这种意义越到后来越更加明确和固定,如朱熹《楚辞后语·毁壁序》云:‘《毁

^① 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47~48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壁》者，豫章黄太史庭坚之所作也。庭坚以能诗致大名，而尤以楚辞自喜。’王若虚《文辨》曰：‘东坡……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这里的‘楚辞’完全指文体。今人谢无量《楚辞新论》则更为明确地说：‘《离骚》流传以后，许多文人拟作，楚辞也就成了一种特别文体。’”^①

第二节 文体意义上的楚辞

一、文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论题

古人在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时，往往先考虑体制问题。《文镜秘府论·论体》谓：“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②宋代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③王安石主张：“论文章先体制而后工拙。”^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认为：“论诗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⑤文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论题，贯穿于整部文学批评史中。文学批评史上许多纠缠不清的公案，如辞赋之别、诗文之分、唐宋诗之争等，都与之有瓜葛，反映了各种文体美学观念的冲突。

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尚书》根据公文用途和特点，区分为典、谟、誓、诰、训、诰、诏、诰、训、诰等几类。《周

① 郭建勋：《楚辞、楚歌、楚声》，载《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3期，35～40页。

②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周维德校点本，1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③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见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④ 见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张戒：《岁寒堂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